

先锋阅读

Xianfeng Yuedu

吴小龙 著

# 细节的警示

Xijie De Jingshi

Wu Xiaolong Zhu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先锋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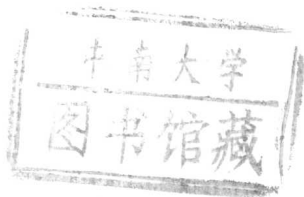
Xianfeng Yuedu


吴小龙 著

# 细节的警示

Xijie De Jingshi

Wu Xiaolong Zhu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节的警示/吴小龙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12

(镜像丛书)

ISBN 7-5426-1878-4

I.细… II.吴… III.思想史—中国—随笔—文集 IV.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7381号

## 细节的警示

---

著 者/ 吴小龙

责任编辑/ 王笑红

装帧设计/ 范峤青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mailto: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3.125

印 数/ 1—5000

---

ISBN7-5426-1878-4

G·644 定价: 22.00元

## 自序

编完了集子，似乎得交待一下自己的想法吧，今天是双休日，“无案牍之劳形”；又恰逢北京金秋特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令人神清气爽，兼以“窗明几乱”，——一位老朋友说过，我的书桌总是乱的，于是欣然入座，展纸命笔。

原想把集子叫《百年逡巡》的，却又觉得这么叫太不提气：徘徊逡巡只该是心有所虑、思有所忧之际一时为之吧，要是“逡巡”上百来年，人寿几何？改吧。因此接受编辑朋友的提议，顺手就把第一篇的标题安在全书之上了。

不过这“细节的警示”恰好也足以表达我学历史这么多年的真切感受。当然，这个“细节”，决不仅仅指历史事件的真实细节，还包括历史思考方面的具体内容。就我自己的专业——中国近现代史和近现代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第一，目前史学界的研究所展示出来的历史真实和细节，就足够给人们相当多的启示和警示了。第二，尤其是在思想方面，当我们直接面对那些离我们还不太久远的前人，直接面对他们留下的那些文字时，他们那曾经有过的思考更是足以给我们无尽的触动、震撼和思索。我想，甚至可以这么说，对于任何真正想获得思想启悟和研究灵感的人来说，千万不要去看那些浩如烟海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而是要去“直面圣人”



看看他们的原著，那里能给人的启示和愉悦是今人的无数转述、评论（包括我的这些议论）之类的“二手货”远远不能相比、不能企及的。

比如，我自己就觉得在读陈寅恪、胡适、丁文江、吴稚晖，乃至瞿秋白、蔡和森……之际所得到的感悟是使我愉快的，它给了我对过去那些事件、进程和人物的认识，还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像陈寅恪“咸、同之际”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意味深长、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思考。百余年来，我们一直在中学西学之间来回折腾、争论、混战，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 we 缺少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理性（思想上）和自信（心态上）。这种理性、心态和气度上的“下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在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后最佳的“转型”起点（或者说“机会”）是在什么时候？陈寅恪认为是在咸丰、同治年间。反观过去那令人痛心的机会的丢失，反思那令人忧心的民族心态的不能守持，我认为陈寅恪有相当的道理。我解读他的“咸同之际”的自我定位的文章阐述了我对他的这种理解。也许是由于他的表述过于幽深曲折吧，人们至今还未对他的这种文化认定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对他的解读给了我自己有关的思考一个开端，我还准备循着这一思路再走下去。

社会进步、文化转型、民族振兴，要是缺少心态上的自信和气度，思想上的理性和自由，那是很难指望其成功的。而在这两方面，平心而论，在文化自信方面，我们恐怕都远逊于当年的辜鸿铭、陈寅恪二先生；而在理性态度上，我们更不如胡适、丁文江、周作人这些五四同人。我的《理性追求和非理性心态》一文和关于胡适、丁文江、吴稚晖等人的几篇文字，关注点之一正在

于此当然涉及的则是他们在不同领域里（政治、科学、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理性或者非理性态度。自从二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和中国社会，在一波又一波吁求进步的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推荡中急步前趋，造就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变革的辉煌。我想起拿破仑晚年说过的话：我过去的无数辉煌战果，一个滑铁卢就把它们抹得干干净净了；只有我的《民法典》将永世长存。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中，“长存”的应该是什么呢？历史辉煌终归要消失在历史中的，但历史阴影有时却会笼罩在后人心头；而历史教训，如果被漠视，更会影响着后人。在对理性和进步的追求中，我们常常由于想要急切前行而否定、丢弃了历史进步最重要的东西：理性、自由、宽容。这一点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有过淋漓尽致的表现；甚至于，就是像丁文江这样完全认同于思想自由和理性进步的价值的人有时也不能幸免。评点前人之际，我更不免悚然自省。

但是无论如何，那又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年代。在那巨浪排空，奔涌前去的时潮中，那些各领风骚的弄潮儿（乃至对抗者）都展示了何等魅力炫人的风貌！有辜鸿铭、吴稚晖那种故作夸诞、出语惊人的思想者；有黄炎培、卢作孚那种踏踏实实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路上筚路蓝缕的实干家；有胡适、周作人这种温文尔雅、但却能坚定地坚持着思想自由和宽容原则的传统中的“新派”人物；也有陈寅恪这样为着明确不移的价值认定（“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终身困守书斋的学者。还有邹容、陈天华之类高声呐喊革命的鼓动者，有王光祈这类年轻的志士仁人，他能够以理想主义感召人、并聚集起共同怀抱着“书生意气”的一群社团



精英；还有，从这种“俱怀逸兴壮思飞”的同学少年正走上了改造社会的事功成就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你还能在我们周围找这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纵性任情，又在民族的历史文化上留下了一笔的人物吗？在经历了我们那极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独断的笼罩和洗礼后，你还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如此有声有色的人，拥有一个如此绚丽多彩的生命历程吗？好像是李约瑟说的吧，如果能够选择的话，他愿意生活在公元八、九世纪佛教初传时的新疆。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我们会作什么样的选择呢？

当然有人作过选择。我知道，至少有所谓“六八人”，受感召于从邹、陈到毛、蔡的思考和事功，想做他们那样的有所承担、有所成就的人。然而他们彻底失败了，他们的失败交织着悲剧和喜剧色彩。透过他们的思想终局，我们可以大致清楚地看到一条从邹容、陈天华到胡适、丁文江，再到毛泽东、蔡和森，再到今天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的迁变，以及思想环境、文化氛围的巨变的轨迹。这是足以让人“怅望千秋一洒泪”的迁变。但这个瞻望和思考的结果并不是为了凭吊，而是为了引出一个理应记取的教训：思想资源和思想自由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从五四前后这两方面的空前繁荣，到“六八人”前后这两方面的空前压抑，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乃至民族心性和民族运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包括我对作为“专制的大一统格局中的‘异质文化’的存在”的“延安精神”的评说，也包含着这方面的意味，更不用说与“六八人”的思想追求和失落直接相关的“文革”了。它是应该成为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给我们提供着不尽的反思内容的

一个话题，虽然现在还只能是“多少事欲说还休”。

“少年中国学会”是我几年前作博士论文的题目，我现在也还继续关注、并陆续做着与它有关的一些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少中”这个课题，其份量和理论深度都是有局限的：虽然它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虽然它的会员中后来涌现出一大批从政治事功到科技文艺，到思想文化上都属于重量级的人物，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与少中关涉不大。“少中”只是这些人在人格初型、在思考和事业的萌芽阶段的一个偶然聚集而已。但这个偶然的聚集中却有着时代的必然。从“少中精神”的空泛、浪漫的理想主义，到后来五花八门的出色的文化创造，和政治上成功与未成功但却都颇为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是为何会聚，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不也正是历史和思想史的一幅生动画面吗？“少中”的意味盖在于此。顺便一说：与“少中”有相当密切关系的“国家主义”，也是我们一直对其置之甚苛的一种理论。今天看来，大可重新评说。它至少应归入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是其中一个曾经影响力很大的流派。我为此而写的《“国家主义”理论评析》是本书中惟一一篇未曾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或许，要接受这种评价还得有一段时间？

在我的治学经历中，还有幸关注过一阵“基督教在中国”这个话题。它使我得到的对于终极关怀、对于敬畏的认识，对我后来的思考和治学是有影响的。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既是历史的，它涉及到明清之交的那段传教史，那段未曾成功的文化对话，也是现实的，我对有的学者致力于给“汉语文化”注入某种基督教文化的因子的努力怀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只是我怀有一种



治史者特有的悲观：就像我们已经失去了咸、同之际的文化转型的机会一样，我们可能早已失去了明、清之交的宗教和文化对话、融合的机会了。更何况后来又经历了“铲除”所有这一切的巨大变革呢？

后来这个变革的主要思想资源来自俄罗斯。我谈瞿秋白、蔡和森的思想经历，尤其是谈贝利亚及其相关的问题，都涉及这个思想资源和体制模式。俄罗斯问题，对于中国的好几代人，都不仅是个理论探讨的课题，也是心灵中的一个情结。何以竟然？我现在还不敢下结论，还得再想想。计划中，我还要用一组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种思索中的追踪历史，在百余年中徘徊逡巡，也许是一点儿过于沉重了吧，所以，作为休息和调剂，我也常喜欢看一些科学家们写的东西，从爱因斯坦，到玻尔，到玻恩，等等。但我在其中决看不到令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国人们如此信任、如此兴奋的科学的“凯歌行进”，而是感觉到哲人们那更为沉重的忧思。本书所选的两篇文字，算是这种阅读的一个记录。好在，在这种忧思中，也还有思考的乐趣。

这个交代大体的思路，还真写成一个思想“交代”了。这使我不无庆幸地想到，不过三十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正在被迫写着无穷无尽的、不断自辱的“思想交代”，相比起来，“今人”真是万幸。其实，当我写着书中这些文章（以及这篇文字）的时候，有时我自己也不敢断言，这是历史思考，还是人生思考；有些明眼的朋友可能会看出，我在评说别人的时候，也不时隐含或流露着对自己的批判和挖苦。另外，这些文字涉及的面不少，作为一本杂论，理清所有这些问题当然是不可

---

能的，我尚无此学力，本书也难以容纳这一切。在这些领域里，我只是有兴趣，率性为之而已。在这里，只能算留下它的一些片断和侧影吧。意思和思路其实都在文章里了，本想就这么交给“读者诸君”评判的，但被告知：要写“序”和“后记”。我知道这两样都是称为“书”的东西应该遵循的模式，因此就不好意思说不写，于是就硬着头皮给自己写“序”吧。对于没有对抗各种“规范”的牛气的人来说，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学那竹竿上晒着牛鼻裤的阮仲容先生，来个自我解嘲：“不能免俗，聊复尔耳”。

最后，还得学一句：

“是为序”。

2003年10月25日

写于京西凝寒书屋



自序	1
目录	1
细节的警示	1
李鸿章的悲剧	13
试析清末留日学生革命倾向的形成	19
长歌召国魂	
——谈邹容和陈天华	43
“王法”时代的文化自信	57
“咸同之际”的文化定位	
——对陈寅恪的一种解读	68
“国家主义”理论评析	83
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	
——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评议	109
从胡适挽叶德辉的诗说起	134
丁文江论科学和宗教：八十年后的反思	147
谐谑中的深刻思考	
——谈吴稚晖	158
卢作孚的思想遗产	171
黄炎培的忧思与欣慰	184
“少年中国”的追求和失落	
——简评少年中国学会	196
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	
——关于瞿秋白	220

悲情·人格·思考	
——《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	232
转折和误区	
——蔡和森早期思想的个案分析	248
思想资源与思想自由	
——也谈“六八年人”	266
平静的回忆和回忆的平静	
——读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279
“萨斯”：人·自然·社会	286
“巨变”前的忧思	
——读欧文·拉兹洛《巨变》	294
重读玻恩：人类的希望何在	303
一生真伪有谁知	
——关于贝利亚	316
失落的对话	
——评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329
基督教在中国的限度	
——读杨慧林《中国文化基督教的消解》	345
戊戌“七”君子	
——关于徐致靖	351
“我常有一种梦想”	
——丁文江的治军梦	356
中国船王卢作孚	362
瞿秋白与毛泽东	369
柳亚子所哭的“无双国土”	382
谒张自忠墓	390
纯文学期刊：还能再辉煌吗？	396
后记	403

## 细节的警示

古希腊一个哲人说过，读史使人智慧。这话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毛泽东就一生读史，他从中既读出了智慧，也读出了权谋；既读出了激情（如读《南史·陈庆之传》：“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也读出了迷误（如在大跃进时，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大讲《张鲁传》），因此不可一概而论。大体说来，读史可以有三种。一种是如马、恩之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研究西欧封建社会结构，从而进行对人类的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思考，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这实际上不是去得到智慧，而是在创造智慧。这是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的理论创造过程，它实际上与“读史”无涉，也与常人读史异趣。第二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读史”：对中国人而言，也就是过去的二十五史和现在形形色色的“通史”、“史纲”。这种读史，似乎也不能说无用，但我想，它更大的“用”不是给人“智慧”，而是给人“信仰”——或者是纲常伦理、王朝正统的“教化”，或是“历史规律”、社会发展方向之类的“信念”。这，从最好的方面看，也只是前一种历史智慧的创造之后的普及版，是其运用和解说。这种读史，人们或者也可为自己明了了“天下大势”、“历史方向”云云自我振奋一番，但说到底，它给人的不是智慧而是迷信。还有一种，是鲁迅曾反复提倡的读野史：稗官野史和笔记杂

著——这野史的“野”，当然不是指那信口胡诌的小道传闻，如近年人们热衷炒作的什么“文革纪实”；这种“野”，是指正史为了其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摒斥不取、讳莫如深、乃至文饰改纂的实情、细节。它也包括一些其时其事的文件史料，这些，实际上“质”得很，一点不“野”。例如鲁迅提到的明成祖“靖难之役”后的大清洗，有处理某人尸体的批示：“抬出东门外着野狗吃了，钦此！”寥寥数语，比什么都更能让我们明白当时的文明与野蛮、政争的残酷，和这位皇上的观念、性格和心态。这种读史，能否读出智慧也不可说，也许也只能读出“古今皆然”的无望和牢骚满腹，但我想对于认真的读者和思想者，它纵然不能就展示智慧的高峰，至少也提供着启发思考的警示。

以这种方式来看这150余年的历史，给人的感觉恐怕就与读正史大不一样了。自正史、“教科书”看这百年来，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前半段不断下降的轨迹，以及某个转折点后不断上行的轨迹。那看来是一段与今人相去甚远的历史，无论其不幸，还是其奋争，还是其辉煌，都与今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恍若隔世（它也确实已“隔世”），只有它所预示的辉煌，或者与今人相关。这样看历史，只能支撑一种虚骄的乐观、助长国人本已擅长的健忘——遗忘不幸，也遗忘教训。而一旦我们想从这正史之外多探究些历史真实，以补充那条太嫌简略的线索而形成有血有肉的生动的历史画面，那么，由细节记载构成的真实历史场景大约将不免让人出一身冷汗。我们会清楚地看到那段历史并没有过去，百年前的先人的经历和今人几乎毫无二致：睁眼看世界的历程和认识的递进与后人相似、所做的事和曾有的辉煌相似、

面对的弊端和一筹莫展的困局也相似。他们的失落不能不让人警惕：那一页究竟翻过去了多少？

我们不妨借助细节再来回顾一下这段经历：

大约1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场历史变局：一个从未听说过的“蕞尔岛夷”，不知从何冒出来，仗着他们的“坚船利炮”，竟然打败了我们这个有着皇皇数千年历史和文治武功的“天朝上国”，乃至于竟要我们割地赔款！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中国人震撼了，于是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而在此之前，我们是除了周边几个臣服纳贡的“蛮夷”之外，完全不知还有所谓四海五洲的。——当初面对接踵而来要求订约的列强，有的廷臣忿然道，根本没有什麼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之类国家，那全是英夷为了骗取赔款，瞎编出来凑数蒙胧人，蒙骗圣听的！后来才发现世界果然很大，于是就有《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的编撰。国人从这些书里知道了：英咭俐“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毋须人力。”还有，佛兰西“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他们还知道了世界上还有欧罗巴洲、墨利加洲（美洲），有变法而强的俄国“比达王”（彼得大帝）。这些介绍中那种谈论域外奇闻的惊异口气和神情，令人不禁想起文革刚结束的七十年代末，开放伊始，中国派出的一些出访人士，归国后做的一系列“传达报告”，向国人介绍当时的西方世界，其惊讶不止的口气和在国人中产生的同样惊讶不已的效果与此几乎毫无二致。而最让当时中国官僚震惊的，则是这些夷人的“坚船利炮”所代表的强大武力：“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

整，天下无敌”，于是就刺激了大清朝廷文武中较开明的一部分人物学习西方的急切心理。从林则徐的积极筹划“船炮二事”，到李鸿章的认定夷之优长，仅在“铁甲兵船与开花大炮”，一旦中国也有了这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这半个多世纪里，船炮所代表的先进军事技术和装备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和赶上西方的标志。林则徐就曾急切地说：“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但他老人家，当年向美国人买了一艘1080吨的大船“剑桥号”并装了34门英制大炮，却不知用来出海作战，而是摆在珠江口内作障碍物兼炮台，结果是让“夷兵”爬上船来，连船带炮给开走了。）在镇压国内的太平军时，曾国藩又提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左宗棠更从不愿受制于洋人的角度出发，创办福州船政局，力图自制轮船，他说：“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技以制之。”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后，这成了19世纪后半叶国人的共识，而且为此作出了认真不懈的努力。从租雇到购买，到引进生产线自造，想法做法都与今人如出一辙。到19世纪末，应该算中国人手中的船炮相当风光的时代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拥有四五十艘战舰，其中包括当时在世界上算很先进的重型铁甲舰定远、镇远号（吨位达七千三百多吨，还配备12英寸的巨炮和14英寸的铁甲），这支舰队，当时在世界上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强，居世界海军第8位。还建成了旅顺、大连、威海卫、大沽口等新式要塞炮台。当时的淮军也差不多全是



西式装备和训练，而后来荣禄的“武卫中军”里，还配备着连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的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于是，在当时称得上高科技的先进武器——“铁甲快船”和“开花大炮”全都有了，中国的国防近代化已很具规模，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样只凭大刀弓箭与洋人比赛。

改变落后挨打局面的急切心情加速着国防近代化的进程，国防近代化的需要又带动了军工、民用近代工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些发展对新式人才的需求又产生了同文馆等洋务文化教育事业，一个以自强新政为旗号的洋务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在当时是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带来了许多新气象的，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兴”，并非全无道理。而且不要忘了，以洋务运动开始到清王朝结束的这半个世纪里，虽然不断地有各种内忧外患的冲击，但自强新政的标榜是清政府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事业，是其从未改变的既定方针和基本路线，富国强兵更是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过的愿望和努力。可以说，是这些努力的成果，使当时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仍维系着一线生机。当然，后来也是这些努力由于中国固有的、特殊的国情而遭受的种种曲折顿挫，最终在风雨飘摇中把清政府送上了末路。而在这终局到来前，它是曾几度像有起死回生的机会的。

洋务运动的成就、局限和失败有过许多论述，这里不用多说。它不是晚清惟一的一次现代化努力，在洋务运动沉寂后，在戊戌和庚子两次大乱后，清政府在其末期还在慈禧的授意与支持下搞过一次“新政”。它经常为人们所忽略，但实际上，它也曾取得不小的成果。当时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如修建铁路（到1911年修建铁路九千二百多公里）、发展矿业